

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续)

郁龙余

(中文系)

三、对我国汉族文学的影响

佛教曾在我国与儒、道成鼎足之势,流行了近两千年。其间,虽然发生过几次佛教徒称为“法难”的灭佛事件,但时间大都不长。在我国几乎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及其文学对我国汉族的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 对文学体裁、文学题材的影响

我国文学以古代神话为最早,继有诗经、先秦散文、楚辞、秦汉词赋、汉代传记文学和乐府民歌。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建安文学、陶诗、南北朝乐府民歌和骈文兴起的同同时,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志怪小说产生了,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文学类别。志怪小说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但是,佛教及其文学对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另外,鲁迅先生还写道:“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其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脱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

志怪小说的数量很大,除了鲁迅先生提到的《灵鬼志》之外,还有张华的《博物志》,曹丕的《列异传》,王嘉的《拾遗记》,刘敬叔的《异苑》,祖台之的《志怪》,刘之遴《神录》,谢氏的《鬼神列传》,殖氏的《志怪志》,郭季产的《集异记》,干宝的《搜神记》,吴均的《续齐谐记》,曹毗的《志怪》,托名陶渊明撰的《搜神后记》,托名郭宪著的《汉武洞冥记》,托名东方朔撰的《神异记》,托名班固著的《汉武故事》,托名任昉作的《述异记》等等。

志怪小说受到佛教影响,除了“阳羨鹅笼”、“鸚鵡扑火”等故事直接取材于佛经之外,更主要的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之上。佛教徒为了弘扬佛法,动用了当时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同时对风盛一时的玄学采取比较亲近的态度。这样,就使得那些不满黑暗政治、只得在清谈中寻求寄托与安慰的文人很容易接受佛教所宣扬的那一套人生哲学。所以,在他们的志怪小说里,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天堂地狱的思想

本文前两部分已刊1985年第一、二期。第四部分因版面关系略去。

以及规劝人们皈依佛门,成了一大题材。例如著名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阮瞻”的故事和“蒋济亡儿”的故事,《冥祥记》中的“沙门开达”的故事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是志怪小说的糟粕,但是其中不少作品写得曲折动人,在写作技巧上给了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益的借鉴。

志怪小说除直接受到佛教及其文学故事的影响外,还受到它的间接影响。佛教的东传和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与佛教的争斗中,道教一方面努力创造、大量改编民间神话和民间传说,用以丰富、加强自己;另一方面则从佛教中吸取能借用的成分。这样,就使得许多描写中国神仙鬼怪的志怪小说,也往往带上了佛教的影子。

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盛极一时。在这类小说里,印度故事的影响也很显著。^①

跟志怪小说一样,传奇小说的兴起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到唐代,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受到世家豪门的压迫。为了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了传奇小说这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小说,早在我国汉代就有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更有志怪小说的大量涌现,但是总的来说,唐代以前的小说,篇幅大都很短小,内容也比较简单,描写手法也不多,往往从头至尾都是平铺直叙。而传奇小说的情形则大为不同,许多作品结构宏伟,布局严谨而巧妙,情节复杂,故事有头有尾,遣词造句也很下功夫。毫无疑问,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传奇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大量运用诗歌,这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形式,就是从佛经和变文中学来的。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传奇小说跟志怪小说一样,也受到了佛教的很大影响。如阴司地狱、轮回转生、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在唐宋传奇中常常出现。唐代传奇受到佛教影响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有关龙王和龙女的故事。

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但是在我国古代神话里,龙并不是什么水神,而是拉车代步的象牛马一类的东西,与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龙不大一样。

《山海经·海外东经》云:“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内西经》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两龙。”

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写道:“把海神想象为龙类,大概盛于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说洞庭君与钱塘君均为龙王)……”^②这种“想象”当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由于受到了汉译佛典的启发和影响。

在印度语言中,nāga一词的意思是蛇,也指一种人首蛇身的神。在翻译佛经时,佛教徒将ānga译成了龙,将nāgaraja译成龙王。有龙王就有龙女,佛典中不少经卷都有龙王和龙女的故事。如《华严经》中有无量诸大龙王,如毗楼博叉龙王、娑竭罗龙王等,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云云。又如《法华经》说:有龙女常听文殊师利菩萨说《法华经》,深受教化,后来见佛献宝,变成男身,立地成佛。《旧杂譬喻经》中有一个“龙女出游”的故事,一开始讲:“昔龙王女出游,为牧牛者所缚捶。国王出行界,

见女便解之，便使去。龙王问女：‘何因啼泣？’女言：“国王枉捶我。”龙王曰：‘此王常仁慈，何横捶人？’……”在这个佛经故事中，龙王是个拥有大量财宝，通晓百兽鸟虫的语言，能“化作数百头羊度水”的神。

《柳毅传》对龙王和龙女的刻划描写，大大超过了佛经。在李朝威的笔下，龙王龙女完全民族化了，成了两个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性格鲜明的文学形象。

佛经翻译以唐代玄奘为界线，在他以前的称旧译，他和他以后的称新译。一般来讲，旧译大多古质严谨，但不少译品晦涩难读，新译则有很大改观，译品一般都比较通畅流利，文采也好。然而，不论旧译也好新译也好，对一般的布衣百姓来说，都难以通达真意。这就成了佛教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僧尼们便对佛经进行俗讲，就是用白话叙述经义、偈赞歌唱的形式，把佛家教义通俗化、故事化。果然，这种俗讲形式大受人们的欢迎。封建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佛教。到了隋朝唐时代，这种俗讲的形式极为盛行，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俗讲僧”。开始，俗讲僧们比较拘谨，宣讲经义不敢离题太远、发挥过多。后来，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听，他们对佛经的演绎越来越多，文学的色彩愈来愈浓。例如《维摩诘经》中“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这么仅仅十四个字，竟被敷演成了人物众多、情节生动曲折的长篇俗讲。

这种俗讲的底本被称为“变文”。变文俗讲，不仅一般的老百姓爱听，而且连士大夫阶层甚至皇帝也爱听，韩愈的《华山女》诗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官廷”，描写的正是这种盛况。

在数目众多的变文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的影响最大。它是僧人根据《佛说盂兰盆经》、《经律异相》等佛经演绎而成的。讲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因不敬佛、法、僧三宝，结果坠入阿鼻地狱，目连为救母亲，出家苦修，证得阿罗汉果。到地狱中见母亲受苦，他多次向佛请求，母亲才转生为狗。目连按照佛的教导，设盂兰供养，遂使母亲得升天上。这篇变文宣扬的是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思想，影响是消极的。文中描写了一幅阴森可怕的阴曹地府的图景：“女卧铁床钉钉身，男抱铜柱胸怀烂，铁钻长交利锋刃，馋牙快似如钻锥。肠空即以铁丸充，唱渴还将铁汁灌……”目连变文以及整个佛教对阴曹地府的描写，对我国后来的冥土故事的影响很大。茅盾先生《神话研究》一书中指出：“后代的书籍讲到冥土的故事极多，然而大抵掺入了佛教思想、印度神话，已经不是中国民族的神话的原样子。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恐怕是中国本有的冥土神话绝灭无存的最大原因了。”^③

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变文发生了两个变革性的转折：一是内容逐渐离经叛道，向非宗教的方向发展；二是摆脱了僧尼独家经营的局面，出现了大批以说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

在变文初兴之时，其内容清一色全是佛教故事。俗讲僧们所以那样不辞辛劳，目的是为了宣传佛家教义。但时间一久，老百姓听厌了佛教的内容，就渐渐创造了大量以中国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古代神话为内容的变文，逐步摆脱了佛教的束缚。这就使变文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一种我们人民喜爱的崭新的文学体裁。这类作品是变文中的精华，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

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董永变文》，等等。

变文的语言通俗易懂，结构奇巧，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具备了白话小说的许多特点。变文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论其内容还是其韵文和散文相间的文学形式，都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说唱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真宗时(公元998—1022年)，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民间说唱变文的艺人也受到了打击。从此，变文这种风行一时的文学体裁便消声匿迹，默默无闻了。但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说话和话本小说开始于隋唐时代，到了宋代，尤其是在变文遭到禁止以后，说唱艺人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说话和话本小说的创作之中，使得说话和话本小说在宋元两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由于变文的突然消失，给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疑难。本世纪初，发现敦煌藏书中有许多变文、话本、诗词和其它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变文不但对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而且对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民间说唱文学的日趋成熟，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关于变文对我国说唱文学影响，除了敦煌藏书中的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活的证据。

我国吴语地区，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叫“念宣卷”的说唱形式。“卷”就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宝卷，念宣卷就是说唱宝卷。演出者三至六人不等，伴奏的乐器有木鱼、竹板和钟。演出时，根据实际需要每个演出者得扮演几个角色，说唱相间，说的是散文，唱的是韵文。每当某个演出者唱完一个段落，其他演出者一齐跟着和唱“南无”或者“弥陀佛”。这是佛教留下的一个尾巴。不管所唱内容与佛教有无关系，只要唱完一段，众人必和“南无”或“弥陀佛”。在上海浦东一带农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后来，艺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觉得这尾巴迷信落后，就将它改成了“解放”一词。

现在，再来看看变文对我国戏剧的影响。

戏剧在我国出现得很早，“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①“唐变文与唐戏之关系最为显著者，以现有资料言，莫过于《维摩诘经变文》唱白分清。”^②李商隐在他的《骄儿诗》中写道：“或学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鹅。又复纱灯旁，稽首礼夜佛。”这一段对儿童学戏的生动描绘，告诉我们在唐代佛祖释迦牟尼已经被搬上了舞台。

元代杂剧的兴起，使我国戏剧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变文对杂剧以及对杂剧之后的戏剧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伍子胥变文》之后，元代杂剧中有《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采石渡渔父辞剑》、《浣纱女抱石投江》、《说专诸伍员吹箫》，明代有《举鼎记》、《浣纱记》，直到今天犹在演唱《文昭关》；在《孟姜女变文》之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孟姜女送寒衣》，元代杂剧《孟姜女送寒衣》，明代的《长城记》传奇，清代的《杞梁妻》传奇，一直到近代还有孟姜女的戏；在《王昭君变文》之后，元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明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元代石君宝的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则是《秋胡变文》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变文，也对我国戏剧产生过很大影响。由《目连变文》演变而来

的《目连戏》，同时因地而异，种类很多。明代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是一部长达一百多出的大型连续剧。各种《目连戏》曾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风靡一时，往往一演就是几个晚上，吸引无数观众。因为它是神怪戏，许多地方在演出时有不少讲究。例如，体弱、怀孕和面带晦气者不得观看，因为据说每演这出戏，观众中必定会生一个，死一个。又如，看完戏必须天亮后回家，不然会把鬼带到家中，等等。由此可见，虽然这出戏假借地狱世界对人间黑暗的现实社会有所揭露，但是它主要是宣传迷信，劝人遁入空门拜倒在佛的脚下。所以它的消极影响很大，它的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

印度文学的影响除了上述的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其它中国古籍甚至正史中找到。例如，《三国志·魏书》卷二十《邓哀王冲传》中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戏”的故事，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著名寓言《黔驴之技》，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里的“鼠猫”的故事等等，都明显地打着印度文学的印记。

这个“鼠猫”的故事来源于《五卷书》第三卷。它除了在《应谐录》中有类似的记载之外，还一直在我国汉族人民的口头流传着。故事说，一个苦行者将一只小老鼠收为义女，用法术将它变为一位姑娘。后来义女长大成人要出嫁了，日、云、风、山她都不中意，最后她嫁给了一只能在山中打洞的老鼠。相传老鼠成亲那一天是正月二十五，所以每年一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点灯，好让害怕光亮的老鼠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拜堂成亲。除了这个故事，在民间还有一幅“老鼠成亲”的木版年画^①。画面中一群老鼠穿红戴绿，吹吹打打，一顶花轿中坐着一位妙龄女子；新郎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花轿前面，一只老鼠替他执着华盖，另外有两只老鼠各擎着一面旗帜，旗上写着“囍”字。真是好一派中国民间迎亲的喜庆景象，全然看不出一点儿印度的痕迹。可见其“国有”到了何种程度。

现在，再简单谈谈佛教对中国文体产生的间接影响。

东汉年间，随着佛教的东渐，印度的声明论（音韵学）传入我国。印度僧人在传教及译经时需要学习汉字，他们就用梵文字母注音。由此中国学者受到启示，就用两个汉字做字母拼汉字字音，将中国原有的急读合音法发展成了反切法，改变了昔日那种“读如某字”的落后注音方法。这在我国音韵学史上，是一大变革性的进步。到齐、梁时，沈约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辞章的创作之中，不但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而且身体力行，创造了风行一时的“永明体”。这对我国韵文从古体阶段逐渐进入律体阶段产生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我国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语录。这种文体语言朴素，活泼生动，明白易懂。它的产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宋两代，禅宗在我国十分兴盛，禅宗对日常生活采取“随缘任运”的态度，一切言谈举止，纯任本然。所以，禅师们说法开示也都单刀直入，明白如话。禅门弟子将师傅的言论记录下来，便称为语录。例如《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等等都是，数量很大。宋明的理学效仿禅宗，将理学大师们的言论记录整理成语录。这样，语录便成了记录传道、讲学、论政用的一种新的文体。

自然，理学受佛教影响，不仅仅是这么一个语录的问题。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指出：“其实宋儒是以孔子为招牌，大量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修养

方法。如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去人欲’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是如何教人消灭罪恶,拯救灵魂,进入天国(理想的精神境界)的问题。”^①理学在宋代具有很大势力,在明清两代在思想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存在不能不对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写道:“……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理学家的这种“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的思想,正是佛教将教义当作灵药、故事当作包药用的树叶的思想的翻版。其结果,只能使文学作品充满封建说教,脱离现实生活,走上僵化和窒息的绝路。

2. 对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的影响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不少形象,是从印度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龙王、龙女之外,还有如来佛、阎王、观音、四大金刚、十六罗汉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鬼神。这些形象虽然来自印度,但是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有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例如那位观音,原本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位男菩萨。可是从南北朝起,观音在中国寺庙中被塑成了女相,文学作品中也被描写成一位美丽的妙龄女子。渐渐地,同西施、王昭君一样,观音成了美女的代名词。如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描写王公小女三巧儿时写道:“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观音性别的变化,说明中国文学已经对这位印度菩萨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文学形象之一。关于这一形象的来源,中外学者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归纳起来,大凡有三派意见,一派是外来说,认为孙猴子诞生于印度,是舶来品;二是原产说,认为孙猴子来源于《古岳渎经》中的“无支祁”,是中国的土产;三是结合说,认为孙猴子既不是纯粹的舶来品,也不是完全的国货,而是二者的结合和发展。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结合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李羨林先生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中旁征博引,对孙猴子的来源作了翔实的论证。他指出:“我的意见是,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和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再加以幻想润饰,塑造成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泼的,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

近年来,日本学者矶部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他发表文章认为:孙猴子的产生与唐代盛行密教、崇拜观音的背景有关。密教经典《白宝钞》的《千手观音法杂集》里说,护法神大猕猴是千手观音的亲随。在《觉禅钞》卷三“药法师”的十二位神将中,有一名安底罗大将,是申位,猴头人身。因此,护送唐三藏玄奘去西天取经的猴行者的形象,还来自护法神将。

矶部彰还认为:孙行者的形象与张世南的《游宦记闻》所记福建永福县流传的猿猴的故事以及洪迈的《福州猴王神记》所讲的内容有关。在南宋末刊出《西游》之前,在北宋末南宋初之际,就存在猕猴行者奉三藏法师取经的故事。原来的猕猴行者只是与西天取经有关,后来吸取了福建野猴的故事和风俗而丰富起来。以齐天大圣为前期,皈依佛门的悟空为后期。花果山上野猴的特性,是宋本《西游》中完全没有的。

矶部彰还认为,孙悟空身上还加入了中国传统雷神(雷公祖)的形象,两者融合在

一起了。

以上矶部彰的这些见解，对于探讨孙悟空的来源问题不无裨益。它基本上可以归入结合说之中。

另外，孙悟空的形象与影戏中的猴王有一定关系。影戏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印度的影戏也很发达，并且随着商人先后传入缅甸、爪哇、暹罗、占城而至我国。印度最早的影戏演的是罗摩和悉多的故事，其中猴王安伽陀的角色最为重要。南宋时，影戏在我国十分盛行。印度的猴王皮影戏大概就是在那时候传入我国南方的，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今天，福州、漳州，泉州一带仍然称影戏为“皮猴戏”。

还有，我国元代时印度教曾在泉州一带有很大影响。印度教建造的庙，规模宏大，当地人称之为“蕃佛寺”。这些寺庙在元末就已经被毁，但大量的印度教石刻却留了下来。在这些精美绝伦的石刻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占有重要的地位。《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一直被印度教奉为圣典，哈奴曼的形象由印度教徒介绍到泉州是完全可能的。泉州是当时中国有数的大商港，人员来往频繁，流量极大。所以，这个哈奴曼通过口口相传来到长江流域和中原一带，也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材料告诉我们：孙悟空是中国的无支祁和印度神猴的结合和发展的这种说法，是较为合理的。

除了孙悟空，《西游记》中猪八戒和沙和尚也受到了印度的一定影响。^⑧

由于佛经的大量汉译和佛教在中国的长期盛行，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印度梵语的译词和借词。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说：“……其见于《一加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词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也，实汉、晋、迄唐几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这些译词和借词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来自梵语的译词和借词，大部分被淘汰了。但是仍有相当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与汉语原有的词汇水乳交融，派生出了许多新的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我们不妨把其中最常见的一部分分类写在下面。

常用的一般词汇有：“宝塔”；“地狱”；“法宝”；“阎王”；“菩萨”；“造孽”；“因缘”；“慈悲”；“真谛”；“因果”，等等。

常用的成语有：“一尘不染”；“大慈大悲”；“三生有幸”；“四大皆空”；“极乐世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海无边，回头是岸”；“神通广大”；“在劫难逃”；“半路出家”；“菩萨心肠”；“粥少僧多”；等等。

常用的谚语有：“一人吃斋，十人念佛”；“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小庙里放不进大菩萨”；“不入佛门不受戒”；“不见真佛不烧香”；“不看僧面看佛面”；“无事不登三宝殿”；“宁舍千斤献真佛，不拔一毛插猪身”；等等。

常用的歇后语有：

“阎王审案子——尽是鬼事”；“阎王爷不戴帽子——鬼头鬼脑”；“阎王奶奶害喜病——怀鬼胎”；“泥菩萨洗脸——越洗越难看”；“老虎挂佛珠——假慈悲”；“佛爷脸上刮金子——刻薄”；“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等。

还有一些常用词汇，如“唯心”、“悲观”、“知识”等等，虽然是近代从日语中借来的，但是追本溯源，它们都出自汉译佛经。日本人把它们借用过去，赋予新的意义，而我国又从日本借用过来。其意义虽然已经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它们毕竟源于佛典。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佛教的传入确实对我国语言的影响很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十分善于学习，对外国的东西具有很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上面所列举的一般词汇、成语、谚语和歇后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以印度外来语为材料改造加工而成的新词语，大多数已经失去宗教的色彩，甚至看不出外来的成分了。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不仅大量地出现在人民的口语中，而且大量地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成了中华民族文学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汉族文学接受印度佛教及其文学的影响，具有深广和持久的特点。从魏晋六期的志怪小说，唐宋的变文、传奇、诗词，宋元的话本小说，元明的戏剧，一直到明清的小说，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如陶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样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历代封建帝王为了麻醉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我国盛行了近两千年之久。佛教徒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动用一切宣传手段弘扬佛法。佛教有一套比较完整、缜密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醉作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对它很容易接受，希望从中寻求寄托和安慰，并努力用文学的形式把他们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

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文学中的许多故事水平的确很高，有的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中国文人的兴趣和喜爱。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把中国汉族文学深受印度佛教及其文学的影响的问题，放到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背景中去研究，就会发现这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当然，印度佛教及其文学对中国汉族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消极的影响已经逐步消失，积极的影响则被保留了下来，并将永远地保留下去。

注：

① 见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② 茅盾：《神话研究》，第一九五页。

③ 茅盾：《神话研究》，第一八三页。

④ 任半塘：《唐戏弄》，第三九〇页。

⑤ 任半塘：《唐戏弄》，第九〇四页。

⑥ 参见《民间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王树村收集整理《老鼠嫁女》。

⑦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序第四页。

⑧ 参见季羨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第一七一页。

Indian Litera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continued)

Yue Long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bstract

This essay renders a rather detailed analysis and study on Indian litera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1. Tracing back to the very source of Sino-Indian literary exchange, the paper deliberates on the unique function Buddhism performs in this respect.
2. On the numerous literary works in the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classics, the essay offers a selective criticism.
3. As regards Indian literature's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styles, subjects, imagery, as well as language.
4.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are also presented in respect to the various degrees of influence the Indian literature exerts on the three Buddhism-Worshipping minority nationalities—the Tibetan, Mongolian, and Dai, as well as on the Islam-worshipping national minority—the Uighur.